

記者的重量

黃順星 著

台灣政治新聞記者的想像與實作 1980-2005

本書榮獲2011年「曾虛白先生新聞學術著作獎」



◎ 巨流圖書公司 印行

記者的重量

台灣政治新聞記者的想像
與實作 1980-2005

 巨流圖書公司印行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CIP)資料

記者的重量：臺灣政治新聞記者的想像與實作。
1980-2005 / 黃順星著。-- 初版。-- 高雄市：
巨流，2013.11
面；公分

ISBN 978-957-732-485-6 (平裝)

1.新聞從業人員 2.臺灣

895.1

102023584

記者的重量

——台灣政治新聞記者的想像與實作
1980-2005

作者 黃順星

責任編輯 李麗娟

封面設計 鍾沛岑

發行人 楊曉華

總編輯 蔡國彬

出版 巨流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80252 高雄市苓雅區五福一路57號2樓之2

電話：07-2265267

傳真：07-2233073

e-mail: chuliu@liwen.com.tw

網址：http://www.liwen.com.tw

編輯部 23445 新北市永和區秀朗路一段41號

電話：02-29229075

傳真：02-29220464

郵撥帳號 01002323 巨流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購書專線 07-2265267轉236

法律顧問 林廷隆律師

電話：(02)29658212

出版登記證 局版台業字第1045號



ISBN 978-957-732-485-6 (平裝)

初版一刷・2013年11月

定價：32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本書如有破損、缺頁或倒裝，請寄回更換)

成為可能的方法

《記者的重量》一書脫胎於「曾虛白先生新聞學術著作獎」的博士論文。個人有幸擔任該博士論文的口試委員，當時便想這本論文應該出版以擴大社會影響力。如今該論文經擴充成書跟讀者面，樂以為序。本書細緻地思考記者的位置、媒體的理念和社會的構成，展現出新聞專業學者的高度，以及社會科學研究的深度。這不只是一本書，而是一份關懷、期待和深入的自省。

《記者的重量》一書展現出順星在人類學、社會學與新聞學的學術底蘊，除了動手動腳找資料的經驗調查，還有更多的概念反省，以及從理論、理想所發動的對話。通過記者職業或志業的討論，思考記者靠媒體而活或為媒體而活的分別，有自覺意識的反省、思索媒體作為一個獨立場域的理想。理想，本來就具有不易實現的特質，但作為理想，總是有對照著現實不理想的價值。理想的設計需要好的社會（制度）發明，雖然落實不易，但這些理念的提醒、啟發、對照，對於正當的方向，總是提示著信號。

很長一段時間不買報紙了，除了網際網路的發達之外，主要的原因是媒體似乎已定型成為替特定對象服務的角色，無法藉之以了解社會。盡管如此，媒體仍在創造事實，建構社會。對於如何建構一個獨立自主的新聞業，擁有不受外界利益、業主、政治所支配的空間，我們需要更好的社會（制度）發明。經費也許可以來自國家、業主、基金會，但如何打造媒體成為公共所用的場域，乃是大哉問。

媒體要怎麼存在，已經有許多檢討，重要的並非是獲得一個答案，

而是不斷反身自省的精神。只有持續的思考媒體應該怎麼存在，才能使媒體朝著理想的方向前進，也只有不斷思索記者的角色，才能觀察、衡量記者的重量。成為記者，不依賴市場邏輯或政治正確；作為媒體，依循媒體自身場域的邏輯，不斷思索其可能性，便是使其成為可能的一種方法。

張維安

2013.11 於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

記者志業的政治認知

布迪厄（Bourdieu, Pierre）的《學術人》法文版在 1984 年問世。開宗明義，布迪厄當時藉著引述他人之言，表明「歷史學家無意書寫歷史學者的歷史。」推而廣之，學術人研究人文社會與自然的萬象，卻往往獨缺一門，較少解剖本行本業。同理，記者忙碌內外，或有些牢騷，卻較少完整地自我省察，學界對於傳播者的研究，也是稀疏零落。

三十年已過，研究學者與記者的著作，質量已有變化。海外世界不說，就看台灣，相關研究的進展尚稱略有可觀。1984 年以前的大約 40 年間，我國碩博士論文在題名出現「知識份子」的篇數僅得 6 篇，其後至今已見 54 篇；出現「記者」的篇數是 4 與 238 篇。論述兩類知識活動的人數躍增，部分因素是高教人口的成長，另有部分應該是知識人自覺意識的強化，表現為相關論述的增加幅度明顯可見。

不過，同時關照學者與記者的學位論文，在台灣可能就只有黃順星博士這一篇。

《記者的重量》通過歷史的對照與社會科學的考察，試圖描繪並分析海內外記者職業與志業的類型及其關係與變化，文獻的檢閱與耙梳之外，作者的研究選樣過程頗見新意，總計從五家性質有別的報紙，釐定了 1948 至 1981 年間出生的 36 位政治新聞組記者，進行深度訪談、整理與歸納。

撫今追昔，對於台灣記者之「知識份子的身影逐漸渺小，記者的重量日益消瘦」，作者感受深刻；對於大多數受訪記者對於新聞行業「自

主專業社群」的創造，「不是嘲諷，就是不感興趣」，作者難以理解。專業組織，無論是否冠上工會之名，不是一種保障記者編採工作的合適途徑，甚至是不二法門嗎？「為何」我們的記者會比較熱衷或認同於「單打獨鬥的英雄」，而不是自助人助、衆志成城，通過結社的道路來保障或彰顯記者的工作？

原因無法在此細究，但可以先談兩點。

首先，記者（特別是採訪的工作）的勞動性質，可以容許單人作業，不一定是集體分工，其他行業（特別是製造業）則經常必須在相同的空間，相互搭配與協調。由於記者在相同的空間工作，孕育共有體驗的機會相對較短，彼此不容易交流情感及鍛鍊認知。至今，平面傳媒的記者隨通訊工具的發達之後，遠距工作使其不必，或是更少進入傳媒組織，同僚相見的次數只減不增，更加使得人通過人際互動形成的關係，以及結合商議的管道，逐漸遭致機械的中介接觸所取代。

新聞工作的性質之外，台灣資深記者對於專業組織的信心與興趣欠缺，另一個可能原因，應該與集體組織的性質有關。無論是新聞人或是其他行業，在創社集體組織（如工會）時，都得面臨集體組織是一種公共財，成立或生產之後對於所有人都有好處，但若要新設或要做後續的維持，成本相當高昂，致使乏人先行投入，也較少人願意主動承擔創設的風險（如，假使業主威嚇，成立工會就會更難），大多數人寧願搭個便車，等他人創造了公共財且證明能夠長期穩定存在之後，再行加入。新聞人如同你我，同樣會有慵懶或搭便車的不良習慣。

不過，以上源自職業性質與催生公共財的困難，舉世皆然，所有國家的新聞人都需面對，不是台灣獨有。單舉近鄰南韓為例，根據楊虔豪的報導，2011、2012年的首爾仍有大型勞資衝突，傳媒人拒絕屈從，雙方對峙、傳媒人罷工數回，總和起來時間超過半年。假使不是「養兵千日」，平常就有集體組織籌集資源，哪裡能夠應對來自業主對於新聞

人工作的不當侵入？相比之下，台灣是全球罕見，傳媒工会的組織極端不發達。不但各家衛星頻道公司與有線電視系統沒有工會，銷量最大的兩家報紙，《自由時報》迄今仍無工會，《蘋果日報》去年「因禍得福」方始得以成立工會。既然沒有以工作場所（公司）為主的工會，代表全國記者或新聞人的工會，從來無法存在，雖然 1996 年曾經有人努力過，一度擁有將近萬位會員的「大眾傳播工業聯合會」留下了足跡，即便印痕不深。

記者與傳播人的有效組織無枝可棲，這是台灣特有的現象，必須從我們自己的歷史過程找尋可能的答案。這段歷史與韓國不同。韓人在韓半島居住與活動超過兩千年，漢人在台島四百年；清朝在 1895 年割捨台灣，日本在 1905 年強制韓國成為其保護國。二戰以後，來台的國府統治者，即便內戰落敗，已有統治中國大陸的經驗，這與韓國南北分裂後，必須新創統治機器不同。這些差異在傳媒的顯現，同樣突出。《朝鮮日報》與《東亞日報》在 1920 年創辦，目前仍是南韓發行量最大的兩家報紙；《台灣民報》完全是另種光景。除了遲至 1923 年才由東京留學生以週刊形式創辦，1927 年才能入台，又到了 1932 年才獲准轉作日刊，卻在運作 5 年後就因局勢變化，漢詩之外，不能再以漢文報導新聞或評論，接著被迫改名、合併而在 1946 年 3 月停刊。葉榮鐘之女葉芸芸為蘇新的文集撰寫了〈遠道不可思〉代序文，起始就說，「重複出現斷層，世代之間無法積疊歷史傳承，仍是台灣近代史的危機」，信然。

1920 年代的台灣，已經進入日本殖民統治 20 餘年，武裝鬥爭因為犧牲慘重等因素已經退場（除了 1930 年的霧社事件），第一次世界大戰致使歐洲民生凋敝，日本崛起順帶要使台灣經濟有所發展，包括受教育人口顯著增長。這些背景還得加入一筆：蘇聯的社會主義革命讓日本與台灣在內的世人無不感應，遂有台灣的民權運動在近百年前開始勃興，「治警事件」並未消弭台人的反抗與追求，反而如同今日，我群的

認知與覺悟因為鎮壓而勃興，遂有台灣文化協會、台灣工友總聯盟（至1929年初已有會員1.1446萬人）、台灣民衆黨、台灣共產黨，以及其他大小與持續時程長短不一的結社，前後修正、承繼或分裂，此起彼落並未止歇。惟在日本帝國擴張與軍國主義高漲之後，日本國內的左翼與民主政治的力量都已備受壓制，遑論台人？1937年日本侵略中國，戰爭全面開打後，本島的民權運動（包括漢文報刊的編採發行）更是爲之中斷。

在那個年代，民權運動的主流匯聚在「工農組合的民族主義」之主張與組織運作。殖民最後八年，台人求進的反抗組織因戰爭而更難維繫。其後，隨日本戰敗，二二八事件致使報人、進步實業家王添燈慘遭殺戮，但以文論政的活動在台灣仍在奮進。只是，再過了兩年多，國共內戰、韓戰爆發後的世局，已有差異，白色恐怖、國府領受在中國大陸失敗的經驗，所有組織工作而特別是各種自主工會，若非消失，就是落入國府掌控而不可能自治。

肇因於殖民統治與冷戰格局，國人的工會等結社經驗，以及其他社會所能積累的進步能量遭致腰斬，無從傳承、中斷了五、六十年，即便解嚴也無法迅速回升，如同手足禁錮已久，鬆綁之後，安步當車都有困難，遑論健步如飛。何況，1980、1990年代的台灣，經濟號稱黃金時期，以後見之明看來，更多人收入中產化所造就的結社、特別是工作場所的結社（工會）之效能，遠遠少於中產化帶來的懷柔作用。主流廣電與報章媒體尤其是受經濟增長之賜，其高度寡佔地位讓東主長年獲得暴利，部分用來分潤員工。何況，在高度管制的年代，當時的傳媒幾乎沒有國際競爭壓力，正可圈地而顧盼自雄，這就使得傳媒行業的安穩相比於其他必須競爭（含海外競爭）的產業，顯得更爲安逸，傳媒人自我組織的想法，爲之再弱一城。另一方面，傳媒作爲重要的統治戰略之一環，國府並未忘卻，箝制的棍棒之外，另有蘿蔔。因此，1984年國府制訂《勞動基準法》時，就讓工作型態迥異他業的「大眾傳播業」，與

另六類行業平起平坐，同樣列入可以受到勞基法保障（勞保等）的七種行業之一。

本世紀以來，情勢已在轉變、仍在變化。經濟成長趨緩甚至下滑、經濟分配更為不公平，加上昔日的傳媒管制思維與能力不再，各級傳媒的競爭激烈，即便仍可獲利，較多的傳媒利潤不再豐厚，新聞傳播人的工作條件比起先前，已見差異。客觀的環境不利依舊，人們的主觀感受已在調整，因此，談記者的 242 篇學位論文，有 194 篇是在 2000 年（含）以後出現。新聞傳播人的工作條件日趨惡化的年代，出現了這麼多的論文，究竟怎麼解釋，又代表哪些可能的意義，這得分析。但是，若說近十餘年來，相比於接受黃博士訪談的記者（重要經歷是在所謂的經濟黃金時期，佔了大約九成），這些新進本行的人對於記者的集體組織之印象、認知與期待，若說會有相當的差異，可能不讓人意外，即便他們對於記者組織的需要，不能立刻催生這個組織的成立。

但是，如同沒有人是孤島，也沒有任何記者單靠自己的努力，即便是記者的集體努力，就能夠讓記者本行得以在合理範圍內，發揮本行的志業願景：遂行公共服務，揭發黑暗，表彰光明。

這個公共服務的志業不會僅只是強調個人的成就。雖然，每當讀到這樣的事蹟，無論是調查報導記者史東（I. F. Stone），或是「有名的記者、主播和節目主持人艾德華·莫洛（Edward R. Murrow）…正義凜然地教訓張牙舞爪的麥卡錫，振奮全美久蟄之人心，潮流轉向了…他對美國廣播新聞的影響是石破天驚的…」，誰人不振奮，有為者亦若是的心理自然浮現。然而，新聞傳播事業不能單靠明星記者，道理淺顯。否則，新聞自由的百餘國排名，美國不至於是第 47 名（巴黎組織的調查）或第 22 名（美國組織的調查）。否則，美國傳媒中，相對最受信任的電視，其比例也不會低到 2012 年僅存 21%（1992 年仍有 46%）？這些，難道不是因為美國傳媒屬於資本體制的成分稠密，美國人能夠享

用的公共廣電金額一年僅 1.43 美元，落後新聞自由名列第一的挪威（109.96 美元）與第二的芬蘭（130.39 美元）太多所致嗎？1990 年代的美國，人口與經濟成長都很可觀，其報章廣電也都高度獲利，但 1992 年至 2002 年間，它們還是要裁減編採 6 千人，賺了大錢還是要裁員，那就更不用說虧損年代的 2011 年，美國新聞人的裁減量還要比 2010 年多 30%。等而下之，美國「自動化啓示錄」公司每週通過電腦運算，生成一到兩萬篇報導，供應上百房地產及體育新聞網站；該公司居然預測，來日通過電腦運算所產生的新聞，將會愈來愈重要！

同理，英國的《太陽報》與 BBC 在其各自領域，都是讀者，或者聽眾與觀眾最為青睞的龍頭。這就是說，《太陽報》在報業蕭條的現在，每日仍有 225 萬份銷售量，遙遙領先第二名的《每日鏡報》120 萬份，BBC 在 2012 年仍然佔有英國收音機市場份額的 55.9%，電視的 33.3%。但這只是數量上的相同，二者的體質與認知差距很大。BBC 的存在就是只服務閱聽人，不服務商品（資本）增殖，因此沒有廣告、不按片付費，所有英國人都定期出資作為 BBC 的主人，BBC 的所有內容都是公共服務，都開放讓英國人盡情使用。《太陽報》不講公共服務，若講，就是將其等同於股東的利潤，因為該報及其相同類型的媒體認為，股東「追逐個人的利益…促進了社會利益…比他真正想促進社會效益時所得到的效果為大。」不過，很明顯的是，對於這兩種公共服務觀，英國人給予不同的評價，《太陽報》與 BBC 記者的受信任度，不可同日而語。高達 73% 的受訪者相信 BBC，但《太陽報》僅得 9%！為什麼出現這個巨大落差？兩個傳媒機構的體質差異所致，BBC 是人民責成政府所創造的非商業機構，《太陽報》是私人為求牟取利潤且將其歸入散戶極大股東的荷包，是私人為牟取私人的政經及社會影響力而造就的傳媒。

這樣看來，除了是職業之外，記者（與學者）即便只是為了得到職業尊嚴，也必須爭取更多的志業空間，使其定位往公共服務的方向移

動。公共服務無法只是記者、也無法只是學者自己的事情，如同台灣高等教育工會已在 2012 年成軍，並且頗見積極介入高教的措施與政策，但假使政府稅收不足、投入高教的經費有限且不均，那麼高教的公共服務理念也就無法彰顯、物質基礎也就不能穩定，如此，高教工會的效能就會受到侷限。高教工會反對教育商品化的加深，理由在此。惟這裡的公共服務與本書提及的「公共新聞學」，並不相同。作者介紹了「公共新聞學」，但似乎仍有懷疑，因此文末贊同他人之見，指「當代新聞的問題不在新聞疏離於公眾，而是…資本限制」。

記者要怎麼樣才能重拾，或說另起爐灶打造時代需要的志業，雖然這不是本書所要回答。但黃順星博士既然在書末指認了問題，那麼，來日，讀者或許會很希望看到作者的追究，進而看到作者更多的詳細解惑。起腳點仍然可以是「公共新聞學」：美國的公共廣播電視相比於日、韓、歐、加、澳，非常之小，地方報紙的壟斷程度之高又不是前述國家所能望其項背，何以前幾年高唱，並且實踐了公共新聞學若干年的呼聲，來自美國的報紙而不是廣播電視？又何以近作《數位斷訊》的作者麥克切斯尼（McChesney, Robert）當年會對公共新聞學之說，大表懷疑。

更值得一書的是，作為自由左翼激進派的麥克切斯尼，他與自由中間派、2004 年 4 月應《天下雜誌》邀請而訪台、就任哥倫比亞大學校長後立即積極改革哥大新聞教育的包林傑（Bollinger, Leo），兩人的立場有別，卻能在傳媒改革的內涵取得共識，難能可貴。

麥克切斯尼說，相當多的人認為，為了謀求私人利潤與政治影響力的各種媒體，在通過媒體競爭的過程，儘管存在一段時間讓人不快，甚至損害民主、傳媒內容同質化或極端化、嚴重失去平衡，但優勝劣敗的淘汰必定不能跳過，度過這段不平衡的階段，最終必然重回意見市場的均衡與豐富。真能這樣嗎？無論是前人的眾多舉證，或是麥克切斯尼的

近日分析，無不指證歷歷，若是聽任傳媒自由競爭利潤，新聞事業服務民主的效能就在扭曲之同時，不能達到更為合理的層次。麥克切斯尼又說，慈善事業對於新聞事業的捐贈，或科技如網路的進展所帶來的好處，固然理當歡迎，但民主生活所需要的新聞事業，無法仰仗個別的善意或技術的變化。根本之道必須從政治認知開始，「體認（好的）新聞是公共之善（public good）。」站穩並鍛鍊這個政治認知，才能研擬「明明白白的公共政策，落實人們稱之為補助的公共投資。」麥氏認為，若要促進新聞事業，使其服務民主，這是不二法門，公共投資的規模愈大，傳媒所能善盡的民主效能，就會跟隨提高。

包林傑作為美國公法學及傳播政策專家，應邀撰寫《不羈不絆、健全壯實、廣泛開放：論新世紀的自由傳媒》。他說，美國第一憲法修正案有三個柱石，當中，第三個柱石要求政府「為了改善傳媒表現而規範傳媒」，但這部分是「談及美國新聞自由與憲法傳統時，最被忽視的一個柱石」。包林傑說，學者與記者應該共享的理念是，「進入本行，必須為了服務公共之善而來」，而單靠市場秩序無法提供充分的公共之善，因此「最為重要的是，我們必須理出更好的系統，以公共基金興辦傳媒…情勢嚴峻…來日終將印證…挹注公共基金…這是維繫自由傳媒的唯一辦法。」

麥克切斯尼與包林傑的見解超越了美國民主黨與共和黨之見。在台灣，追求記者與學者是職業，更必須是志業的人，同樣必須超越民進黨與國民黨之識，在公共投資是必要條件的政治認知之後，早日共同提出超藍克綠的傳媒改革階段及其藍圖。

馮建三

2013/10/28 猴山·首次與野猴相遇

自序

本書主要是拆解「文人辦報」，此一自戰後影響台灣新聞界至今的主導性論述。在報禁的年代報業不曾正視本身即為產業的現實，報禁解除後主管當局採放任政策，導致報業在有限的市場中競逐爭利。經營者只能汲汲營營於削減支出，難以生產符合讀者所需的新聞，連帶使勞動條件惡化，造成記者在工作滿意度上的衰退及專業認同的弱化，新進記者也不再以文人或知識份子自居，更不視新聞為終生志業。倘若連被認為與公共事務高度相關的政治新聞記者都不再以知識份子自許，那麼在新聞專業及學術場域內，該提供何種專業規範以評判記者與新聞傳媒的行為？

台灣新聞傳媒的危機，不只發生在經濟結構對專業行為的傾壓，也在從業者拋棄知識份子與文人辦報的包袱後，無法產生新的專業與群體論述。沒有主導性論述的社群固得以百家爭鳴，但不存在論述與敘事傳統的社群也難以產生有效的行動。一位受訪者的話至今仍在腦海迴盪：「新聞工作像宗教一樣，你要相信它，相信那個價值。」傳媒環境因產業的獲利動機日益惡化，固然限制記者能揮灑的專業空間，但記者也絕非因此甘受擺佈。若非前輩記者對新聞工作的熱情，讀者看不到被掩蓋的弊端醜聞；若非新聞同業對專業倫理的堅持，政黨黑手不會就此罷休。為何曾經產生集體行動的新聞專業社群，如今卻垂首無力？

同樣地，「文人辦報」的迷思也限制研究者審視報業的多元面貌。報紙不只是批評時政與理性論辯的公共空間；報業也並非只依賴政黨要聞或時政議論而獲讀者與市場青睞。新聞場域中還存有多樣的新聞類型

與從業者，自始就無法以文人或知識份子期許其專業角色。我們是否曾思考在諸如社會、藝文、影劇或運動新聞中，如何才是好的、專業的實踐？這些不被重視卻又廣傳於街頭巷尾的新聞，對公共文化又具有什麼意義？這些都需要更細緻地耙梳後，才可能在新聞場域內重構符合實際狀態的多元典範與專業倫理，也才能以此期許記者之所當為。這些問題與分析是本書力有未逮之處，也是日後努力的方向，更應該是傳播學界所應承擔的公共責任。

本書主要的研究與寫作時間為 2007 至 2008 年初，距今已有五年。近年台灣傳媒陸續發生的重大事件如：《中國時報》易手由旺旺集團經營、壹傳媒爭取上架未果、因旺中集團併購中嘉網路引發反媒體壟斷運動等。這些後繼事件的發展與影響，自非本書寫作時所能處理。世局動態總是與時俱進，講求速度與時間的傳媒產業，其變遷步調更甚於其他產業，但不變的是這些現實的衝擊使我們有機會一窺傳媒營生的真實樣貌。台灣新聞傳媒的困境，不只是文人不敵商人，或新聞專業屈從財務報表，而是我們一直誤將浪漫的文人情懷投射為真實，不曾體認與接受殘酷的現實。雖無需抹煞曾經燦爛耀眼的昔日，但也必須在充分理解過去後，思考台灣傳媒未來的出路。

本書為本人同名學位論文的增修，新增第四章從專業社會學的脈絡討論新聞記者職業角色的變化與影響；另補充台灣媒體發展現況的統計資料，並在增引訪談資料後，將記者世代差異的討論擴充為第六與第七章。第五章曾刪節改寫後，以〈新聞的場域分析：台灣戰後報業的變遷〉為題，發表於《新聞學研究》第 104 期。論文研究寫作並承蒙世新大學舍我紀念館補助。

書籍出版，首要歸功於接受研究訪談的衆多記者前輩，若非他們敞開心胸的分享人生經歷與個人反省，這本書只會是堆積灰塵的學究之言。已辭世的指導教授成露茜，是她給予嚴格的審視與批評，才讓論文

初稿稍具規模不致羞於見人。儘管拖延許久，本書終得以出版，實現自己在老師生前對她許下的承諾。葉啓政、張維安、馮建三、羅曉南、林富美老師們多年的督促與提攜，誠非三兩句能道盡。同學林照真的激勵，讓我相信自己可以作得更好。已成爲妻子的瓊瑤與小五狗兒，妳們的燈夜陪伴是我與世界的溫暖聯繫。是鮮少對談的父親讓家裡堆滿課外閒書、黨外雜誌與報紙，才塑造現在的我。無法一一細數的朋友們，我由衷感謝你們。

黃順星

成為可能的方法／張維安	__1
記者志業的政治認知／馮建三	__3
自序／黃順星	__11
第一章 緒論	__001
第二章 記者的回歸	__015
一、台灣新聞場域的變遷	__015
二、世代與場域變遷	__029
三、台灣政治新聞記者的世代	__040
第三章 知識份子的圖像	__049
一、誰是知識份子	__052
二、自由飄移的知識份子	__058
三、與階級相繫的知識份子	__064
四、獨立自存的知識份子	__074
五、知識份子到文化仲介	__082
六、小結：轉向知識勞動	__089
第四章 專業化的文人	__093
一、知識份子到專業者	__094
二、新聞的專業論述	__100
三、士人傳統的過渡	__111
四、小結：隱匿的傳統	__120